当时又届春节将临，旅舍人满为患，嘈杂异常，往往夜不成寐。加之尝到个别文管部门领导人赐予的“闭门羹”,未免有出门难之感。不过在嘉兴图书馆古籍部陆、陶二位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我见到这么多几乎无人问津的珍贵碑刻资料，加深了对明清江南社会的了解，所获非浅。因此，出门难的不愉快也就转瞬间被抛到九霄云外。尽管二十天来两次问渡鸳鸯湖畔，三番出入槜李城中，仆仆风尘，疲惫不堪，但却满载而归，可谓不虚此行了。

读《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

马汝珩　　马大正

最近，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宏钧、刘如仲所著《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以下简称《历史与文物》）一书，这是一本以文献结合文物研究西北民族史的专著。作者在这本著作中利用了大量中外历史文献和国内收藏的历史文物，对清代准噶尔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了系统的论述与研究。

准噶尔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族的一部。厄鲁特蒙古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成员。在元代他们被称为“斡亦剌惕”,明代被称为“瓦剌”,到清代被称为“厄鲁特”、“额鲁特”或“卫拉特”。在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活动于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喀尔喀蒙古等广大地区，其中如土尔扈特部甚至远徙至欧洲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游牧，在清代前期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准噶尔部的崛起，由于它统一了厄鲁特各部以及一些突厥部落后，其影响远及国外中亚地区，因此，人们往往把厄鲁特各部统称之为准噶尔，而包括准噶尔在内的厄鲁特各部历史也因之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与研究。建国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准噶尔史研究的领域不断开拓、扩展，日益呈现出活跃、繁荣的景象。《历史与文物》一书，就是作者在准噶尔史的学术领域中经过努力耕耘之后结出的硕果之一。

该书近十五万字，碑刻、画卷、原始档案等文物插图共四十五幅。全书分十七题，每题以纪事本末体例，结合反映当时历史背景的文物，以重要历史事件为主线，叙述了自准噶尔先祖——元代斡亦剌惕的活动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土尔扈特东返祖国为止的准噶尔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使读者对准噶尔史，尤其对清代厄鲁特各部历史发展演变得到系统认识和完整知识。不仅如此，本书后面附有《准噶尔大事记》和《文物史料》,前者记录了上自十二世纪下迄十八世纪后半期准噶尔史的重大事件，后者选录了反映重大事件的文物史料的原始记录，从而增强读者对准噶尔史认识的系统化，并加深了对每一历史事件的全面了解。

自秦汉以来，我国就走向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巩固时期，而厄鲁特蒙古一直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可分割的成员。但长期以来，在国外某些研究者的著述中，由于他们立场与认识上的局限，往往把准噶尔说成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汗国，严重地歪曲了历史的真相。作者在本书中通过确凿无疑的历史文献与文物，澄清了上述的错误观点。本书一开始，作者即以《为蒙哥汗祝福的石碑和元代的斡亦剌》为题，通过元宪宗时斡亦剌部附马八立托及其妻子悉基所刻立的《释迦院碑记》(见插图1)，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准噶尔部祖先自蒙元时期已成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明朝建立后，

当时被称为瓦剌和斡亦剌部三个首领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勃罗均被明朝封为王，并赐以印信。中间虽经也先的一时割据，但到明代晚期，一些瓦剌部属仍与明朝政府保持隶属关系（见本书《明代的瓦剌三王和也先太师》）。到了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清朝中央政府的势力虽然还没有直接控制到准噶尔部，但包括准噶尔部在内的厄鲁特各部首领，一直与清朝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作者在本书《"四卫拉特"和准噶尔的兴起》一题中，以翔实的资料阐述了厄鲁特各部与清朝政府关系的发展过程（见本书第8—10页）。尽管噶尔丹时曾一度反清割据，但当时的准噶尔部仍与清朝中央政府保持臣属关系，本书通过《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初四康熙皇帝给噶尔丹的敕谕》完全证实了此点。该敕谕中明确指出："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祖父及身，累世竭诚修好，虔供贡赋，实惟有年"（见插图4）。这说明自噶尔丹的先辈即与清朝政府保持长期的朝贡关系。作者通过大量历史事实论证之后，认为"自公元十三世纪初斡亦剌部出现于历史舞台以后，元代的斡亦剌，明代的瓦剌直到清代的厄鲁特四部，始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与我国历代中央政权保持着密切联系"（见本书第10页）。应该说，作者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过程的。清朝建立全国统治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使我国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我国今天的疆域版图，应该说这是清代前期对我国历史作出的重大贡献。本书在《噶尔丹对喀尔喀蒙古的进攻》、《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叛乱的覆灭》、《巴黎报导的"昭莫多之战"和当时绘成的"北征督运图"》、《准噶尔割据势力的瓦解和"平定准噶尔图卷"》以及《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失败和清朝统一新疆地区》各题中，作者利用大量文献资料与当时的历史文物，对清政府平定准噶尔上层贵族割据势力与统一西北地区的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尽管清政府对准噶尔部的用兵是出自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要求，但它在客观上是符合于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正如作者所说："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搞分裂割据是不得人心的，维护国家统一，才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见本书第103页）。因此，作者在阐述清政府用兵准部过程中，以一定篇幅描述了包括准噶尔在内新疆各族人民支持清政府的具体史实。如本书在《准噶尔割据势力的瓦解和"平定准噶尔图卷"》一题中，作者通过当时宫廷画国钱维城所作《平定准噶尔图卷》，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新疆各族人民牵羊捧酒、络绎于道欢迎清军的场面（见插图22、本书第103页）。作者在有关清政府用兵准部的论述上，观点明确，分析透彻，有一定的说服力，给清政府用兵准部及其统一西北地区的历史作用作了正确评价。

厄鲁特蒙古是我国勤劳、勇敢的民族，他们在缔造祖国伟大历史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书对厄鲁特各部人民辛勤开发祖国疆土与英勇保卫边疆的史实，作了充分的论述和热情的颂扬。厄鲁特蒙古各部原本是"不耕五谷，以游牧为业"（椿园：《西域记》卷5）的。但厄鲁特各部人民在其首领们的倡导下，经过长期辛勤劳动，使社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作者在《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时期准噶尔经济的发展与内地联系的加强》一题中，详细地介绍了自巴图尔浑台吉以来的准部畜牧业、农业以及手工业发展的情况《本书第86—88页）。书中以具体资料说明了当时准部的农业已发展到"百谷园蔬之属，几于无所不有"（《西域图志》卷34）的地步，而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如织布、制革和冶铸等业也有了新的发展。这清楚地说明了准部人民在开拓祖国边疆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不仅如此，作者还以极大热情歌颂了厄鲁特各部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边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英勇斗争精神。十六世纪末

和十七世纪初，我国厄鲁特蒙古各部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南的广大地区，其西、北部与西伯利亚相毗连，而这时俄国势力已扩展到西伯利亚地区，并不断向我国厄鲁特蒙古各部进行侵略活动。本书在《巴图尔和僧格时期准噶尔人民的抗俄斗争》一题中，以无可辩驳的中外历史文献揭露沙皇俄国侵略我国厄鲁特各部种种罪行的同时，系统地阐述了准噶尔部军民英勇抗俄斗争的史实，歌颂了准噶尔部首领和人民在国外扩张势力面前不畏强暴、坚决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斗争精神。本书还在《土尔扈特的西迁和重返祖国》一题中，论述了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伟大斗争。土尔扈特本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当时新疆塔尔巴哈台的雅尔地区，因厄鲁特蒙古内部矛盾，于1630年左右迁徙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放牧，在那里居住近一个半世纪之久。但因不堪其北邻沙皇俄国的侵略压迫，于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在其首领渥巴锡率领下，发动了反抗沙俄的武装起义后，经过长途跋涉，冲破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投归了清朝政府。土尔扈特人民热爱祖国、不畏强暴的英雄业绩，是可歌可泣的，是值得我国各族人民崇敬和追念的。作者对土尔扈特重返祖国英雄壮举的描述，毫无疑问，对增强人们爱国主义和反抗斗争精神，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最后，还应该提到的，就是作者以文献结合文物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值得称道的。由于作者在论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同时，密切结合对历史文物的介绍与研究，不仅使读者得到一定的历史文物知识，而且使宏伟而生动的历史场面，通过画卷、碑刻等实物展现给读者，在很大程度上给读者以直观感，使历史知识更加生动化、具体化。如本书通过选用的六幅《北征督运图》的介绍，使读者形象地看到了清军在昭莫多战役中运输粮草的具体情景，生动地描绘出清政府在各族人民支持下取得战争胜利的历史进程。又如本书通过《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和铜版画《平定伊犁回部战图》的介绍，配合以大量文献资料的论述，使读者既了解到清政府先后平定准部、回部贵族上层割据势力、统一西北地区的全部过程，又生动、逼真地展现出当时各族人物形象、风貌、衣冠服饰及行军作战等具体情景。正因为作者的研究采取图文并举、史论结合的方式，所以使读者对书中的长篇论述不感到空乏无物，对大段引文亦不觉其堆砌累赘。应该说，作者在文献结合文物研究历史方面，确是取得了较为成功的尝试。

《历史与文物》一书定稿于1981年，出版于1984年。此间，国内外在准噶尔史的研究中又有些新的进展，而有关的文物和历史文献（特别是托忒文的文献）也不断发现，本书尚未及时利用与吸取，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美中不足之处。我们希望本书再版时，能得到增补与充实。